

一、前言

根據謝國斌(2013: 2)的統計，台灣發行的期刊論文，以「族群」為主題的已有 3,264 篇之多（2010 年 3 月 25 日的搜尋）。王甫昌(2003: 4)多年前就曾指出，這個字眼已經到了被濫用的地步。與「族群」一詞緊密相關的，則是「認同」這個概念。假如「族群」可以指稱某一群體，那麼群體如何凝聚（認同所屬的團體），則可以是社會學者的興趣，Zygmunt Bauman 曾稱認同研究為「茁壯興盛的產業」（引自許維德 2013: 3）。¹

但是，蔚為風潮的研究旨趣，不代表學界對「族群」或「認同」兩個概念有相當程度的共識。震盪於「原生論」(primordialism)、「工具論」(instrumentalism)、建構論(constructionism)之間的爭辯，²使得「族群」的定義問題懸而未決。

反過來看，正因為沒有共識，所以留下諸多開發的空間，也造就「族群」及「認同」研究豐富的生產力。本研究正是利用族群研究仍然百家爭鳴的狀態，從已有的研究成果，結合「認知」(cognitive)的觀點，分析族群現象的發生。選取的案例為台灣學者王明珂的羌族研究，因為從他的羌族研究中，可以看到沒有主觀認知、非常分散而且孤立的人群，如何在國族建立的需要及學術的操作下，相信自己屬於同一民族。另一方面，他所謂的「邊緣研究」盲點又在哪裡？認知取向的觀點，能夠帶來

¹ 但根據許維德(2013: 3)的調查，「認同研究」成為風潮，不過是近 20 年的事情。

² “primordialism”這個詞在台灣有不同的譯法，如根本賦予（謝世忠 2004）、根基論（王明珂 1997a, 2003, 2006）、原生論（蕭阿勤 2010）、原生（王甫昌 2003）等。根據筆者個人的偏好，本研究採用「原生論」的譯法。工具論也有人稱「情境論」(circumstantialism)，在本研究中兩者交替使用。「建構論」的英文有“constructivism”和“constructionism”之分，雖在詞義上並沒有明顯區別，但前者和心理學者 Piaget 的「建構主義」使用同一字。為了和心理學的用法做區隔，本研究採用 Peter L. Berger 與 Thomas Luckmann 所使用的“constructionism”（請參照 Shu 2005: 78）。

什麼新啓發？此即為本研究目的。

本研究首先重建王明珂的研究，從「邊緣」觀點看羌族的建立，再介紹 Brubaker 認知主義的族群觀，然後以「認知觀點」檢討邊緣視角下的羌族史，最後是結論。

二、王明珂的邊緣性考察

如前所述，族群的理論約略可以分為「原生論」、「工具論／情境論」和「建構論」三類（許維德 2013: 118），這構成本研究對「邊緣研究」及「認知取向」的理論途徑分類。而在這一節當中，要觀察王明珂如何將三種立場結合到「邊緣研究」。

以下先從影響王明珂最深的族群邊界觀點出發，簡要述明王明珂的方法，然後敘述「羌族」如何在只有「村落認同」的狀況下，聚合成具有悠久歷史的單一(unitary)民族。

（一）何謂邊緣研究？

影響王明珂最深的是 Fredrik Barth 的族群邊界論，它來自一個經驗前提：族群的成員會流動，但是邊界仍然維持。族群是因為邊界的存在而維持，特別是由「社會邊界」來維持，並非其內涵，如語言、文化、血統等(Barth 1998: 14-15)。因此，「邊界」是相當主觀的，凡是能夠產生對外的「異己感」(sense of otherness)和對內的「根基情感」(primordial attachment)，即為族群的邊界（王明珂 1997b: 130）。王明珂相信，在邊緣位置可以觀察到不規則的、變化的族群現象。

對他而言，族群研究的核心問題是：從工具論的立場，在什麼樣的社會經濟背景與資源競爭中，華夏邊緣形成以及邊緣人群如何進入或脫離華夏？從原生論的觀點，邊緣人群如何假借、扭曲、遺忘歷史記憶，以造成族群認同或認同變遷？最後，從建構論的角度，在一個族群中，認同或族群邊界，或歷史記憶是如何形成的？它主要是誰的認同？誰的